

白居易诗选

〔唐〕白居易 著 汤华泉 注评

国学经典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居易诗选/(唐)白居易著;汤华泉注评.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 11
(国学经典)
ISBN 978-7-5348-3683-1

I. ①白… II. ①白…②汤… III. ①唐诗—诗集
IV. ①I222.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6129 号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河南大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640mm×960mm 1/16 **印张:**18.5

字数:22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版次: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白居易诗选

前言

—

白居易是唐代声名很高的大诗人，也是古代诗人中在当今知名度最高的诗人之一，凡读书识字之人几乎无人不知白居易的名字。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他自称太原人，其实太原是他的郡望，他的祖籍在同州韩城（今属陕西），曾祖白温迁居于华州下邽（今属陕西渭南），遂成下邽人。祖父白锺在河南做官，又移家郑州新郑（今属河南）。白居易于代宗大历七年（772）正月出生于新郑县东郭宅。他的家庭是一个仕宦之家，高祖、曾祖、祖父俱为官，父亲白季庚于德宗建中、贞元间历任徐州、衢州、襄州别驾。因河南兵乱，白季庚在徐州任职时把家迁至徐州符离（今属安徽宿州埇桥区）。贞元末白居易登第释褐入朝为官，又将其家回迁至下邽原籍。白氏家族在士族中较为寒素，其先人官位都不太高，从曾祖下多次因官移家，可见没有多少丰厚的恒产。其家族又是一个大家族，祖父至少弟兄六人，父亲弟兄五人，白居易在同曾祖弟兄中排行第二十二，还有许多弟妹，这样的大家庭在战乱的年代，可以想见其生活的困窘。

白居易于建中末十一二岁时随父寄家符离，因两河战火蔓延，

不久他又到吴越一带避难，在江南淹留了很长时间，直到其父任衢州（今属浙江）别驾的贞元四年（788），这年他17岁，还在南方流徙，以后又往返于符离和其父的下一个任所襄阳。白居易的青少年时代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这样的生活状态影响了他的正常仕进，他在后来的《与元九书》中回忆说：“十五六，始知有进士。”“家贫多故，二十七，方从乡试。”但这对作为文学家的成长却是十分有意义的，这样的经历使得他获得了对社会现实和下层人民生活状况的深切了解和体认。但就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他仍能“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贞元十五年（799），他在南方的宣州（今属安徽）通过乡试获解入京，第二年应礼部试以第四人登进士第，其年29岁。

进士及第后他又连登吏部科目选和制举，由校书郎、盩厔（今陕西周至）尉擢为左拾遗、翰林学士，入仕的开端很是顺利。元和元年（806）在应制举之前曾与元稹闭户华阳观备考，他汇集、整理了社会问题七十五道，一一提出对策建议，这是白居易一次有计划地对社会现实问题进行的系统研究，为他日后入朝参政、履行左拾遗职务、大规模创作讽谕诗作了很好的准备。元和初，白居易就是这样以新锐的政治革新者面貌和活跃的富于创造精神的诗人形象登上政坛和文坛的。

入朝以后至元和五年（810）是白居易从政、诗歌创作双丰收的时期。这一段时间他积极而大胆地建言献策，取得了一定的参政效果，他说：“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与元九书》）著名的讽谕组诗《秦中吟》、《新乐府》就

是写在或基本完成于这个时段。元和元年，任盩厔尉时还创作了《长恨歌》。

元和六年（811），白居易因母亲病故回原籍下邳守制，三年后回朝被任命为太子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长安发生藩镇派刺客刺杀宰相武元衡事件，白居易在第一时间上书请求急捕凶手，执宰恶其越职言事，他人又罗织别的罪名，把白居易贬往江州（今江西九江）当司马，这一年他44岁。江州之贬是对白居易一次极大的政治打击，受此打击他深刻反思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从政取向和创作取向，思想开始趋于消极，创作出现了转向。一般的白居易研究者都把江州之贬作为白居易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前后二期的分界点，是符合实际的。之前白居易那种关注现实政治、关注民生疾苦、大胆谏诤、敢作敢为的热情和勇气消退了，而代之以明哲保身、知足省分；前期“惟歌生民病”、“不识时忌讳”的写作讽谕诗的热情也没有了，编在《白氏长庆集》的四卷讽谕诗共172首，江州作只有11首，之后诗集虽无讽谕分类，但讽谕之作更是寥寥无几。讽谕诗创作的消歇与其政治态度的转变是一致的，他在《与元九书》中说他信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哲学，写诗也以此为准则，“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既然人生态度发生了转变，诗歌创作取向也就跟着变了。他在这封书信里还隐约反思了江州之贬与讽谕诗写作的关系，说是“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在《与杨虞卿书》中更明白地把贬谪的主因归之于“不识时之忌讳”的讽谕诗，“以此得罪，可不悲乎？”因此，写作上出现这一大转向就很自然了。江州期间他写诗近300首，是他一生中作品量比较多的时段，但大量的是闲适诗、唱和诗、山水行吟之作。

在江州贬所过了三年，又在忠州（治今重庆忠县）刺史任上过

了一年多，元和十五年（820），穆宗继位，白居易被召入朝，由尚书郎中而知制诰、而中书舍人，境遇大为改善，似乎从政的热情有所恢复，但又感到朝政并不景气，他的几次建策也不被重视，而朝中的党争初现端倪，于是长庆二年（822），他主动请求外任，到杭州当刺史。杭州刺史卸任后不到一年，又当了一年多的苏州刺史。到苏、杭二州担任刺史合乎他的本愿，情绪较好，在两州也都有可观的政绩。这两处他早年避难时都到过，山川形胜向为他所向往，在这两地他的诗歌创作量也较大，他在杭州写了一首《诗解》，道：“新篇日日成，不是爱声名。旧句时时改，无妨悦性情。但令长守郡，不觅却归城。只拟江湖上，吟哦过一生。”说想在这里快快乐乐写一辈子诗，在苏州时也有如此表白。他在这两地任职时间总和少于江州，而诗的数量多于江州，是白居易外任中诗作数量最多的时段，这其中有大量的山川景观题咏诗。

宝历二年（826），苏州任期未滿，白居易因病免职回朝，征为秘书监，又任刑部侍郎，两任都未到期求免，大和三年（829），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从此以后定居于洛阳，此年 58 岁。后又历河南尹、太子宾客、太子少傅等职，在这最后的 13 年的任职期内他担任的基本是闲散性质的分司官，他称这种就职方式是所谓“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的“中隐”。这是他自江州之后“独善其身”人生哲学的继续，也是在宦官气焰更加嚣张、党争日益剧烈的险恶形势下一种机智的退避和无奈的选择。会昌二年（842），他以刑部尚书致仕，六年（846）八月逝世，遗命葬洛阳龙门，享年 75 岁。

白居易自苏州罢归的 21 年，诗作仍以每年 50 首以上、最多超过百首的数量增长着，可惜其集最后五卷散佚，最后四年的诗作少有存留，就这样今存苏州罢归后的诗歌仍有 13 卷多，超过其全集 37 卷诗的三分之一，数量很大，白居易晚年的创作精力仍然很旺

盛。晚年的诗绝大多数作于洛阳，约有三分之一是与亲朋故旧唱和的，也有一些洛中风光题咏诗，其他则是大量的日常生活吟咏之作、闲适之作。关注现实政治的诗也有，但数量很少。白居易晚年选择中隐，毫无疑问是有意将自己的政治才干置于无用之地，这期间的诗歌创作在选材上、作意上虽不能说是没有意义、不太用心，但大多意义不大、用心不深，千年之后我们对诗人晚年的人生选择自然表示理解，但也为他的用才（治才、诗才）不尽感到惋惜。

二

白居易流传下来的诗有 2800 多首，是今天可以看到的唐代诗人中作品数量最多的。他实际写的诗要超过 3000 首，除了最后几年作品有散佚外，据《与元九书》所述，在入朝做官前“已盈三四百首”，而收入集中的只有 75 首，300 首左右未收。晚年诗散佚还不太可惜，在题材和风格上新特色可能不多，而早期的、正在成长中的 33 岁前的作品一定有很多新异的内容、多样的色调，这对了解诗人的成长道路无疑是十分宝贵的，未能保存，十分遗憾。

白居易也是唐代知名大诗人中得年最高的，身经代、德、顺、宪、穆、敬、文、武、宣九朝，横跨中晚唐，是今天可以知道的唐代创作时间最长的诗人，其最早的作品纪年为 15 岁，临终的当年也有诗作留存，时间跨度 61 年。白居易逝世，唐宣宗写诗悼念：

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

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对白居易诗歌创作的成就作了很高评价，对其创作时间也表述得相当准确。

这“缀玉联珠”的 2800 多首诗是白居易一生文学成就的主

要体现，下面按题材或体裁，介绍最具特色、最有创造性的几种。

讽谕诗

这是白居易对自己早期写作的编在《白氏长庆集》最前面的四卷诗所给的类名，他解释说，“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谓之讽谕诗”。也就是批评时事、揭露社会问题的诗。这个类别立名准确，对题材和创作意图都有明确的界定。这类作品虽起于《诗经》和汉乐府，但明确立类是白居易。白居易十分重视这类诗歌的创作，发表了许多关于讽谕诗写作的理论和方法的言论，表现了很高的创作自觉。

这类诗歌最有代表性的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据其小序，是写贞元、元和之间在长安所见所闻而感到可悲的事：或是民生的困苦，或是社会风习的腐败。《新乐府》是白居易在与诗友李绅、元稹相互讨论、切磋后，继两位诗友之后创作出来的规模更大的组诗，组诗反映的社会问题“自武德讫元和”，十分广泛，作者经过了充分的酝酿、构思，明确了指导思想，制定了整体体例，并一一确定每首的立意，诚如陈寅恪所言：“其全部组织如是之严，用意如是之密，求之于古今文学中，洵不多见。”（《元白诗笺证稿·新乐府》）《新乐府》所反映的问题按类别来说，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边防问题、社会风气问题、礼乐教化问题等，虽有少量誉美者，但绝大多数都是属于针砭、批评的范围，特别突出的是朝政的弊端、君臣的腐败、穷民的哀苦。这些诗鲜明地表现了作者“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的创作宗旨，那些反映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平民、农夫，哀苦无告的宫女、弃妇、冤民，

写得特别真切，特别富于情感。在这些篇章和一些批评腐败政治的作品中，作者常常进入作品或化身为作品的主人公，对权豪势要、对迫害者进行指责，真正充当了人民的代言人，还常常“矛头向上”，直指皇帝。白居易对这类诗歌在语言形式上还作了明确规定：“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新乐府序》）强调语言质朴、观点鲜明、事例真实、篇章顺畅，以便更好地发挥讽谕的作用。讽谕诗这样的写法，求之古今文学中，也是不多见的。

叙事诗

白居易未提出叙事诗的概念，但其纪事、述事的意识和技巧在那个时代诗人中可能是最强的，其集中成熟的叙事诗有 20 余首，也是唐人留存下来的叙事诗作品数量最多的。白居易的叙事诗基本是作于前期，主要分布在讽谕诗、感伤诗中，《秦中吟》有两三首，《新乐府》有十几首，感伤诗中有四五首，最著名的就是《长恨歌》和《琵琶行》。《长恨歌》堪称中国古代文人叙事诗中最杰出的作品，情节曲折生动，人物形象丰满鲜明，文词清丽，又有浓郁的抒情气氛，作者把叙事、抒情和描写完美地结合起来，成为文人叙事诗的典范之作。《琵琶行》与《长恨歌》一起成为白居易叙事诗的双璧，当时流传很广，前面所引的唐宣宗的赞语完全符合实际。《琵琶行》的叙事技巧又更多体现在场面描写、音乐描写和对话艺术上，为日后发展的剧曲提供了艺术经验。《新乐府》中的叙事名篇如《上阳白发人》、《新丰折臂翁》、《缚戎人》、《卖炭翁》等作品的主人公都具有很强的典型性，作者似乎注意到了在类型中取典型的创作方法，而且这四位都是悲剧人物，作品中都有相当出色的心理描写，作者也似乎注

意到了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人物的命运。白居易的多数叙事诗在诗体上使用的是入律的七言歌行，多转韵，音律和谐，流转自如，极便吟赏传诵。

中国叙事诗向来是不发达的，白居易之前除了汉乐府、敦煌变文中有一些作品外，文人的作品是很少的，在白居易之后叙事诗也不多，在中国诗史上，白居易的叙事诗体现了文人叙事诗的最高成就。当然，白居易叙事诗的写作一直得到他的诗友元稹的激发、配合，元稹也写有一定数量的作品，但数量和艺术水准不及白居易。由于白居易在诗歌写作中有较为明显的叙事取向和叙事诗创作的较多实践，这对他的整个创作和诗风都带来了相关的影响，如作品内容上记事成分较多，写作手法上叙述、议论较多，语言上的浅显通俗、章法上的平直随顺也与此有关。

日常生活情趣诗

白居易将早期诗作分为四类的第二类是闲适诗，谓此类作品是“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这类作品绝大部分是写日常生活的，当然感伤诗、杂律诗中也有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在他的早期创作中已占有不小的比例，越到后来比例越大，以致占到压倒性的多数。

日常生活内容是相当广泛的，具体到白居易诗中的表现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饮食起居、家庭伦理、人事活动、趣尚雅好。每个方面又都可细分为许多内容，饮食起居方面包含有饮食、穿着、坐卧、睡眠、纳凉、负暄、沐浴、濯足、病痛等，家庭伦理方面包括夫妇及与弟兄姊妹、子女甥侄、孙辈的关系等，人事活动有莳花种树、筑室疏池、观稼闲钓、延客赴宴等活动及与邻里、游伴、道友的往还，趣尚雅好指作者的精神文化生活，如听歌、观舞、弹琴、观书、吟诗、游园、赏石、养鹤，饮酒品

茗中一部分也可归入其中。

诗歌反映日常生活自《诗经》、汉乐府就已开始，诗史上比较注重写实的诗人这样的作品可能会多一些，比如田园诗人，再比如杜甫，但之前没有哪位诗人像白居易这样把日常生活写得这样丰富，作品量这样大，他写日常生活的诗差不多在每个细目上都是第一，有的还是首创，比如饮食起居的若干细目。这些作品向我们展现了作者的生活全景，使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作为一个官员、一个文人士大夫或一个地方官员、一个退休文人的生活状态。白居易的生活状态应当也是具有某种典型性的，通过他可以认识千年之前同类人物的生活情景。

白居易这些作品的创作显示了诗歌写实或现实主义的深化，在诗歌乃至一般的文学发展上都是有作用的。他在平常的生活中发现了许多诗材，大大开拓了诗歌的表现领域，正如贺贻孙在《诗筏》中所言：“眼前寻常景、家人琐俗事，说得明白，便是惊人之句。盖人所易道，即人所不能道也。”这是他的日常生活诗的重要价值所在。他的关于家庭伦理方面的诗不仅写得多，也写得很用情，很感人，古代的诗评家只评到了他写子女的几首，他写给弟弟白行简的诗多达 14 首，写给妻子、写到妻子杨氏的诗有 40 多首，都是前人所无的。特别是写妻子的，有他对妻子的真情的表白，有二人情感的交流，还有生活细节的描写，十分动人。结婚之始他写《赠内》，表示要生死与共，贫贱相守，在人生的各个阶段如贬江州、移忠州、外任苏杭，都是夫妇同行，都有赠诗之举，直至临终之年他在《自咏老身示诸家属》中还写到夫妻恩爱。古代诗人多有在妻子去世后写悼亡诗的，写妻子生时生活的很少，白居易前杜甫写有几首，像白居易这样大写特写妻子的，绝无仅有。白居易是位多情的诗人，他在诗中也写到

与其他女子曾有过的感情关系，但他对妻子的感情也是真挚、持久的。那些表现趣尚雅好的诗除文学价值外，还具有广泛的艺术价值、文化价值，比如乐舞的描写，比如游园、赏石，白居易应当是最早的苏州园林和太湖石的题咏者。他对园林有很高的鉴赏水准，他在长安、在苏州、在洛阳都写了不少这样的作品，特别是晚年在洛阳，他游遍了许多名园，他是唐代写园林诗最多的诗人。

白居易这些写日常生活的诗都是很生活化的，不少写得很诙谐，很有情趣，博得许多人的赞赏，在诗歌发展史上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可以说从白居易开始古代诗歌创作加速了向生活化、写实化方向发展的步伐，宋代的许多大诗人比如苏轼、陆游都有大量的描写日常生活的作品，显然他们是白居易的继踵者。前面讲了白居易日常生活诗越到晚年写得越多，与官场、与政治生活越疏离，这样的作品自然就越多。从诗里看，他的退休生活很丰富，心境很安恬，一直到生命的终点，他都活得比较快乐，他在退闲时期写的大量退闲诗，对步入老年社会的当下也是具有阅读和欣赏价值的。

山川景观题咏诗

在唐代白居易可以算得上写山水诗最多的诗人了，青少年时代在南北流徙时就写过山水诗，中年之后贬官江州，后又在三个州当刺史，在任职地和往返途中及晚年定居洛阳都写过不少，粗略统计不下 400 首。

所谓山水景观题咏诗是山水诗中的一个类别，它是以某一个特定景区和景点为描写对象，从特定视点进行写作，而区别于一般的山水风景诗和行旅诗。山水景观题咏诗自谢灵运起就有创作，唐代作品量渐多，但具体到某个诗人量还不太大，而且往往

与怀古、咏怀、记事相杂，纯粹的景观描写、欣赏之作不多，而只是到了白居易手里才大放异彩。白居易这样的题咏诗有 70 首左右，主要是写于杭州、苏州、洛阳三地，而又以杭州、苏州为多。这两地向称山水名区，又是他外任时情绪最好的时期，佳景佳兴，相得益彰，“吟山歌水嘲风月，便是三年官满时”，这是他在杭州离任时写的，可以代表他在两州任职的心情。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三有条记述：

钱塘风物、湖山之美，自古诗人，标榜为多……城中之景惟白乐天所赋最多，所谓“潮声夜入伍员庙，柳色春藏苏小家”、“大屋檐多装雁齿，小航船亦画龙头”、“灯火万家城西畔，星河一道水中央”，至今尚有可考。

苏州的情况亦复相似。白居易这类题咏诗的写法往往是大景观的概括与具体景点的描写相结合，自然景观的描写与人文景观的描写相结合，境界阔远，内涵丰富而又真实具体，都表现了独特的地方风光，给两州风光留下了许多诗情画意的记录。

这些题咏诗多是近体，又以七律为多。七律的篇幅不大不小，比较适合一般景区、景点的描写，其起承转合的章法也便于景物的布局，又因其音律的谐和、词句的精练，更便于传播。这些七律中间的对偶往往都比较精巧，或以山水地名，或以方位数字，或以色彩气象，或以植被名物相对，极好地表现了空间时序、山光水色等景区景点的特征，留下了许多精彩的景观名句。白居易的杭州、苏州题咏诗（包括离开后回忆中所写）各有 20 余首，一直到宋代很长时期这两州的题咏都以白居易为最多，查看历代这两处的地志就清楚了。宋代出现了“天上天堂，地下苏杭”的民谚，元代改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白居易在苏杭题咏诗中屡见苏杭并称，这是这两句民谚的语源，而那么多题

咏诗更是催生这两句民谚的绝好粉本。白居易的山水题咏对后世特别是宋代后影响很大，后世的州郡诗中这类作品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是白居易对诗歌发展史和文化史的一个很大贡献，不独对苏杭二州。

唱和诗

唱和诗是白居易创作成就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赵翼在《瓠北诗话》卷四（下引赵翼语皆出此卷）中说：“大凡才人好名，必创前古所未有，而后可以传世。古来但有和诗，无和韵，唐人有和韵，尚无次韵，次韵实自元白始：依次和韵，前后不差，此古所未有也；而且长篇累幅，多至百韵，少亦数十韵，争能斗巧，层出不穷，此又古所未有也；他人和韵，不过一二首，元白则多至十六卷，凡一千余篇，此又古所未有也。”这里讲了三个“古所未有”，第一个有点不确，下两个确然无疑，元白的唱和诗数量空前，各体皆有，“长篇累幅”，“争能斗巧”，也是空前的。赵翼说“多至十六卷，凡一千余篇”，这是引用白居易大和二年（828）《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序》中的话，说的是两人至此唱和的数量，各占一半就是 500 篇，还不包括此后三年二人的唱和，这样多的数量，前所未有的。当然这些唱和诗并未都传下来。

白居易的唱和对象有 20 余人，今存白居易集中唱和诗包括唱与和两个方面的作品数量近 600 首，占其全部作品五分之一左右，这其中有许多优秀的作品，如早期与元稹唱和中的讽谕诗、咏怀诗、百韵长律，后来在杭州、苏州与元稹唱和的山水景观题咏诗，与刘禹锡唱和的咏怀诗、退闲诗、曲子词等，假若白居易集中少了这些作品，那他的创作成就就会大打折扣了。评论白居易的唱和诗还要看他和元稹在唱和诗体式的完善上、唱和诗风的

引领上所起的作用。赵翼说元、白开创次韵，有点不确，因在白居易前卢纶的《酬李端公野寺病居见寄》已用次韵（宋、明还有人举出南北朝、唐初三例，但都不属唱和范围），这是个特例，卢纶这样做也许并无明确的次韵意识，而元、白自元和初在和韵诗中使用次韵后，次韵的意识就十分明确而强烈，其和韵诗绝大多数都是次韵。次韵形式虽非元、白开创，但他们却是最早、最有力的实行者、倡导者，很多古人都把元、白作为次韵的发轫者，不为无因。元、白在唱和诗中还创造了组诗唱和、多轮唱和、多人唱和、叠韵唱和等形式，白居易还提出了唱和诗中“和”与“答”的区分，包括和意、和韵、次韵这些唱和诗的形式都是在元、白手中最后完成的，而白居易出力最多，能为后人提供了这么多的写作法门是值得赞扬的。

“诗到元和体变新”，在元、白的引领下，诗坛上、社会上唱和蔚然成风，终白居易在世之日，这种风气长盛不衰，可以说，中唐只要有一定数量作品存世的诗人，少有未参加唱和的，唱和之风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中唐诗歌创作的兴盛。唱和是诗人群体创作或多边互动创作的一种高级形式，在创作情绪的激发上、灵感的获取上、技艺的切磋上是有积极作用的，是有利于作品的产生和质量的提高的。作者写唱和诗一般都较注重情感交流、信息交流，这样就有可能写出感情丰富、具有感染力和多方面认识价值的作品，还可以发挥诗歌的娱乐、交际功能。唱和诗的创作也有利于诗歌的普及、诗派的形成。对唱和诗于诗歌创作的意义和作用，对元白引领唱和诗风的意义和作用都不能低估。

三

以上择举五类诗对白居易诗歌创作成就作了评介。白居易的